年话

□孙葆元

一到年根人就变得絮絮叨叨的,岁月也絮絮叨叨的。岁月推着人往前走,人一边往前走一边絮叨着岁月。过年还是老话题,老话题里却有新题材,在甜丝丝的日子,窗外寒风凛冽,聚三五友人,围炉的境界是找不到了,在春意盎然的暖室里泡一杯热茶,说说过去的苦、曾经的磨难,那苦就如茶水也滋润着我们的心田。

在六十余年中我经历过各种况味的春节。春节要吃饺子,那饺子却吃出了不同的味道。上世纪50年代初期,迎接春节是一年中的盛事,无论穷富,家家提前一个月就盘算着置备年货,富有富的铺排,穷有穷的算度。大年三十是春节序幕拉开的时刻,久居济南的人家要迎接祖宗。仪式是家族性的,隆重又诡秘,无数人家捧着香火悄然走上街头,到一个庙或龛前,祭拜祈祷,然后折回,算是把祖宗请回家门。那夜,除了连绵的鞭炮声,没有喧哗,家人小心又小声地交流着,怕说出冲撞神明的话。除夕之夜是噤声的。那是刚刚建国的年代,马褂已经绝迹,长袍依旧穿在某些先生的身上,他们敲响亲朋好友的门扉,门开处,便双手一揖,道声过年好。过年必须串门,走动一番,串门拜年是年的最高形式。那个年代的饺子荤素不均,富庶人家吃的是馅,穷苦人家吃的是皮,有其形而已。

这样的日子没过几年便被一场灾荒拖入饥饿的梦魇,家家缺少食物,副食品奇缺,一个肘子、几条鱼都成了最珍稀的年货。我记得,因过年多发了一张白菜票,母亲带着我去买白菜,进入一间街头菜铺,只见墙角堆着一小堆白菜,那白菜似乎也营养不良,全长成了蒲扇,扁扁的,没有菜心。母亲说,这菜怎么吃?挥挥手失望地离去。那三年,过年吃一顿饺子,就把一年的奢望全补上了。

那些年,所有的副食品先凭本后凭票,谁家丢了购物证,那一年就白活了。人活于世,偏偏有得有失,我记得一位同事弄丢了购物证,急得抓耳挠腮,到区商业局去补,人家告诉他,补是不能补的,物资有限,物资能补吗?如果人人都丢一个证,得多少物资补进来?他问,那怎么办?言外之意是我家的副食品怎么买。商业局的负责同志说,你等核发新证吧。核发新证还不得等到猴年马月!他算了算,今年是蛇年,离着猴年还差着三年呢。这三年清汤寡水,还叫日子吗?正愁眉苦脸,他收到一封陌生来信,打开信封一看,里面是他的购物证,还附带一纸信笺,把他好一顿教训,说:你这个马大哈,怎么能把这么重要的证丢了呢,还想过不想过了?为了让你记住这个教训,我把证上今年计划的东西都买了,现在把证还给你,注意保管。好家伙,得了便宜卖乖。

购物证的漏洞很多,开创了熟人社会的购物先河,多买少记,买也不记。后来就改成了票。大到棉布粮油,小至烟酒糖茶,全凭票,一时间,票比钱还金贵,手里有钱照样买不来东西。那时节,人们养成一个习惯,看见排长队的,先问要不要票,听说不要票,不管这东西于自己有用没用,买了再说。人人患了“票证综合征”,家家到了年根,先清点一下手里余下什么票,再到商店抛票扫货,不然这票明年就作废了。

直到买馒头不要粮票了,打油不要油票了,我都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实。经历过灾荒年的人,懂得人们缺油、缺副食品所患的水肿病。那一年,我的母亲因病住院,她的病室里有一位病友,开饭时只吃用水泡过数遍的咸菜,就着白开水。我十分不解,就问母亲。母亲把我拉出去,悄悄告诉我,你这个大姨没有粮食,她的病是饿的。以后不许问这个问题!我才知道有些病不是靠药物来医治的。粮油敞开供应后,那一年春节,家家炸起了鱼或者藕合,满街飘着油香。我国十三亿人口,得多少油和粮?一口口锅的后面,是我们农业生产的跨越。

物质撩拨着我们生活的欲望,济南人家从打水泥地面到捡拾碎砖头加盖棚房,又到旧房改造,再到购买商品房,走过了沧桑般的变迁。从家家打沙发到购买名品家具,到名贵木料家具入室,经历了由寒酸到富裕的历程。我们经历了电视机岁月、电脑岁月,如今进入手机岁月。我们曾追求自行车,一辆木兰摩托车曾经让我们招摇过市,现在开一辆奔驰都不稀罕。这都是年下的话题。人们还在拜年,先是打电话,后来电话也不打了,一个短信群发了事。追昔而抚今,几多感慨。不是我们失掉了多少传统,而是我们生活在一个改革复兴的时代,传统不顽固,终是要跟着时代变迁的。过去过年思量着做新衣,新年到来,能够展示簇新的只有外表一身衣裳。现在的人们不再思量做新衣,因为人的心里是新的,向往着无限新的未来。于是服装市场冷落了,不是市场萧条,是岁月的质地变了。

写春联

□冯磊

我父亲是一名民办教师。上世纪70年代,他在我们村子里的小学里教书。彼时村人淳朴,普遍认不了几个字。因是高小毕业生,他先是跟着宣传队写标语,后来又到扫盲班里教识字,最后去了小学里教书。

有了这点文化底蕴,每年春节,邻居们都拿着红纸,来我们家请父亲写春联。

当时,村里为大家写春联的有两个人:一个是我父亲,还有一位姓苑的老人。那位姓苑的老人受过良好的私塾教育。本族一位留着山羊胡子的长辈告诉我:“(苑先生)这个人肚子里有东西,是老私塾底子。”

我那时并不知道所谓的“私塾底子”究竟意味着什么,直到有一天自己当了中学教员,才知道那是传统文化功底深厚的代名词。再后来我读了作家陈舜臣的《鸦片战争》,看到里面一些清代奏章上的蝇头小楷,才知道村里的苑先生书法功底有多深厚。只是,那时老人作古已经十几年了。

上世纪80年代,苑家枣木门上的春联是最精彩的。客观地说,我父亲的字与那位苑姓老人的字相比,差距实在太大。但是,这并不影响我父亲为大家写春联的热情。

他那一代人,高小毕业生本就不多,更别提民办教师了。我父亲对自己的字有非常清醒的认识。他曾在很多场合说过,自己的字“不入体”。意思是,并不是一板一眼跟着字帖练出来的“童子功”。那时他跟着宣传队写标语,每天都要写一二十张纸,“毛笔当做钢笔用”,与传统意义上的书法练习是完全不同的。五十岁以后,父亲买来一批唐人字帖跟着练习,费了老大劲儿也入不了帖。为此,他颇有几分沮丧和苦恼。

进入腊月以后,父亲每天都很忙。从初八开始,邻居们都拿着大红纸到我家排队。这个时候,父亲开始熬夜写春联,一直熬到年垂这一天(除夕)。年垂那天晚上,当家家户户都剁完馅子,团聚在一起包饺子的时候,父亲才开始动手写我们自家的春联。

我家祖上传下来的一方砚台,周边雕龙刻花,中间是一圆弧形的墨池。先要研墨。父亲往墨池里加了些水,捏着墨块在墨池里转圈儿。接着裁好纸,将毛笔吸饱了墨汁,倏忽提笔,一挥而就。这时候,他的脸上泛起一丝满意的表情,轻声对我说:“拿到一边去晾干吧。”三十多年以后,我还记得那些大大的隶书:“一夜连双岁,五更分二年”“一勤天下无难事,百忍堂中有太和”“喜看稻菽千重浪,遍地英雄下夕烟”……

第二天清晨,我们依例走家串户拜年,小村里有一半春联是父亲写的。那些沾着喜气的大红纸衬着厚重的枣木门,非常精神。

因为父亲的缘故,我从小就写毛笔字。但惭愧的是,一直都写不好。后来去读师范学校,学校开设有书法课。我们的书法老师是省书协会员,字写得很不赖,人却性格古怪,有时极其刻薄。有一次,学校的书法兴趣小组招学员,很多同学前去报名,但入选者寥寥无几。这时候,有同学在书报栏的橱窗里贴了张小纸条表示质疑。书法老师因此大怒。上课的时候,他把西子湖畔岳飞墓阙上的那副对联给所有班级讲了一遍:“青山有幸埋忠骨,白铁无辜铸佞臣”。然后,把这件事和学生的质疑联系在一起,搞得大家都很没趣。再后来,大家都不去书法小组了,我的书法练习也就到此为止。

但即使如此,很多同学仍然坚持练习书法。其中几位,将这种兴趣一直保持到现在,有两三位已经是中国书协会员了。

我父亲的一个同学,在小县城里做过官。一年暑假,我跟着父亲去他家里做客。出门的时候,看到他家门口的对联是这样写的:“龙翔凤翥,霞蔚云蒸”。那字迹金钩银划,飘逸非常。见我对这副春联感兴趣,那长者说,这是本省一位大书法家写的。此后多年,我再也没见到过如此俊逸的书法。

我的朋友余新伟,今天在画坛上已经颇有一些影响。十七八年前,小子尚属毛头。彼时,我们在不同的村子里教书。为解决生活问题,每年腊月他都要连夜赶写春联,第二天清晨去集市上摆摊。那时候,市场上还没有印刷版的春联。每年春节,新伟仅凭卖字竟也能赚上一两千块钱。对普通人而言,这笔钱可以过一个肥年。

这,大约是春节给予书法爱好者最慷慨的回馈了。

除夕的“一脚蹬”

□杨朝竹

“一脚蹬”棉鞋,在40多年前老家沂蒙山区的农村,男女老少都穿,算得上最普通、最普遍的棉鞋,因为这种式样的鞋做工相对简单,款式也算不上难看。大概得用袼褙剪成鞋帮,里子下放一层棉絮,袼褙外的棉鞋面选面料好点的布,用暗线对缝缝实,再在隆起的脊背上用明线横穿,盖住表、里的茬口,而后与鞋底缝合。手巧的妇女还在鞋面上绣上点祥云,或做两对鞋扣作点缀。这种棉鞋,一律口大,且多是越穿越松,洗刷次数多了还极易软塌,但在上世纪70年代初期,甭管大人小孩,在过年时能穿双这样的棉鞋,也是殷实人家所为。

印象中,那时我也就十来岁。那天,是大年三十的午后,我在本家大叔家玩耍,突然间大婶叫着我的乳名,问:你二哥刚替下来一双棉鞋,你愿意穿吗?虽说还没见到棉鞋什么样子,也不知它的大小,我却赶忙应下说“穿、穿”,仿佛说慢了怕大婶改变了主意。不一会儿,大婶拿出她说的那双“一脚蹬”棉鞋,鞋内垫着许多老玉米皮子,外表有些地方已破碎。虽说是双旧棉鞋,我心里却高兴万分,蹲下身立刻把它穿在脚上,并拎着换下来的那双单布旧鞋,朝家的方向飞奔。

由于沉浸在穿上棉鞋过年的幸福时光里,更是少不更事,完全没有考虑老人的感受,回家后先是跑到母亲的床前,告诉她大婶给我一双棉鞋,并抬高脚让母亲看看棉鞋的样子。因为屋里光线昏暗,我没有看清母亲的表情,只是听到她说有这鞋脚就不冷了,并嘱咐我爱惜着穿。年长后,有时候反思自己对母亲的不孝,我觉着向她显摆那双“一脚蹬”棉鞋就是其中罪状之一。

刘禹锡在《元日感怀》中描述过年的情景:燎火委虚烬,儿童炫彩衣。老家的父辈们大都没有进过学堂,自然对春节服饰说不上个子丑寅卯来,可过年穿新衣的传统,却是由来已久,但凡条件允许的家庭,总会穷尽手段给孩子置办一件新衣或置办个小件,或鞋或帽,穿着喜庆。在我儿时,家中人口多,整劳力少,且母亲因病常年卧床不起,挣不到工分,到年底生产队里算账时,大多是倒欠着,所以,过年时姊妹中谁换件新衣裳,在家里可是件大事、难事。

生命的狂欢时刻需要衣饰的辅助,需要形式上的仪典,才能推出意念中的崇高。于是乎,强调以第一次穿着的新衣来迎接大年就有了特别的价值。它让人们在春秋寒暑的轮回中,象征性地回到可以重新开始的原初,汲取新的生命力量,从而获得生命内存与外貌全盘刷新式的变化。不知道,那双儿时的“一脚蹬”旧棉鞋,是否曾使我成为春节期间被关注与赞扬的角色?也不知道,在少年的时光里,它是否给我带来新的起色与好运?可我敢说,那双“一脚蹬”一定曾给予我身体的温暖,而且,它给予我更多的是心灵的慰藉。

前两年,在县城工作、生活的本族成员大聚会上,我给大婶敬酒时,提起那双“一脚蹬”棉鞋的往事,她一脸茫然说,早忘了!闻之,我先是惊愕,后又想,之所以大婶一家和睦、殷实,子女个个事业兴旺,想必是她乐意助人且又不挂在心上的结果。著名电视主持人陈鲁豫曾说,孩提时因自己只有一双鞋,曾对妈妈产生不满与怨言,跟妈妈上街时看到一位失去双腿的青年,她才意识到,自己能穿上鞋,是件多么幸福的事。庆幸自己在儿时遇到了大婶,她给予我“一脚蹬”棉鞋的过往,使我在人生的旅途上,没把贫穷带来的自卑、怨恨装在心底,在那段寒冷的日子里,有了憧憬幸福未来的理由。

现如今,谁家过年不是“贺节纷纷衣帽鲜”?当然,我亦是如此。或许因曾经的体味而增添了质感,“一脚蹬”旧棉鞋有着故事般的桥段,把它记下来,并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连缀。如今,年过半百,仍镂刻在心。

野人怀土,小草恋山。大年即将到来,儿时除夕的“一脚蹬”棉鞋旧事,又令我唏嘘。